

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任：褚申民

副主任：傅继文 李建新 王书年

委 员：景毓梅 张宪文 段素菊 富玉珍

参加编辑人员： 张玉广 杜勤来 孙梅茹

目 录

让“文史资料”在爱家乡的教育中闪亮放光（代序）

……政协石家庄市郊区委员会副主席 堵中民（1）

革 命 史 料

周总理视察留营村……刘志忠记录整理（1）

瓜园客人……王国乔（4）

地下前哨——于底“感化院”……杜勤来记录整理（6）

石桥地下印刷厂……敦春玉记录整理（12）

名 胜 古 迹

毗卢寺初考……朱训晓（15）

浩然正气木牌坊……刘学均（28）

望赵陵缅怀赵佗……刘春海（30）

东垣——真定故城遗址……李建新（34）

白佛与白佛村……李建新（38）

一桥飞架南北 两岸永保平安……李建新（41）

综 合 史 话

前进村（本笃庄）与天主教……王兴来（44）

北杜“明林堂演武馆”……刘学均（46）

清末武探花——敦凤举……敦春玉记录整理（49）

“红枪会”在石家庄……刘学均（52）

回 忆 录

- 郊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回顾.....郭瑞珍 (54)
- 我在柏林庄教书.....王殿功 (57)
- 忆晋察冀边区联中.....李建新 (59)

游 子 心 扉

- 游子归来方恨晚.....傅文秀口述张五月代笔 (61)

地 名 小 考

- 振头与石邑故城.....李建新 (65)
- 汉代古墓——云盘山.....王兴来 (68)
- 刘秀和陈村.....苗银虎 (70)
- 石桥村的来历.....李会茹 (73)
- 太保与太保庄.....吴瑞霞 (74)
- 南高营为什么分南北.....李建新 (75)
- 岳村与岳村铺.....敦春玉 (80)

资 料

- 历届郊区政协组织系统表..... (82)

周总理视察留营村

刘志忠记录整理

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难忘怀的日子。

那是一九五九年六月的一天上午，我以石家庄日报记者和驻村工作组的双重身份，和郊区留营村的村干部王满红、梁喜禄、袁凤鸣、杨风英、梁三福等一起，一大早就吃罢饭，各自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等候在留营村村南，我们作梦也没想到，敬爱的周总理一会儿就要来留营村里视察。

这一天，天气格外晴朗，因为刚过芒种季节，地里的麦子刚开镰，农民们正在马路北的麦地里紧张地收割小麦，位于马路南的棉花丰产方地块，棉花已长到一尺多高。

十点钟左右，我们看见了十多辆小轿车、由东向西徐徐开来。中间的一辆灰色小轿车，当开到离我们约四、五米后停下来。这时，车门打开，从车内弯腰走下一位熟悉的身影：“啊，周总理！”有人喊了一声，大家骤然紧张起来，难道来到面前的就是蜚声海内外的人民总理吗？只见总理面带笑容，浓眉下慈祥的眼神，显得格外亲切，他上身穿鱼白色短袖衬衣，下身是灰色裤子，脚踏园口黑色布底鞋。总理从车上下来后，向远方环视了一下，然后扭头健步向我们这边走来，一把握住了大队长王满红的手，操着普通话温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王满红。”总理听后马上重复道：“王满红，满红，这名字起的好，满天红

吗！”说完爽朗的笑了。这一笑，使大家原来紧张，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总理又和村党支部书记梁喜禄紧紧握手，然后在市委书记王力等同志的陪同下，向马路北的那块正在收割的麦地里走去，边走边问村干部：村里有多少劳力？多少亩地？，人们一天吃多少粮食？粮食够不够吃？都一一过问。总理来到麦地后，他用手掐着一把麦穗又问王满红：“这里的麦子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王满红回答说：“这里的麦地离村子近，长的不好，好地块都在南边，一亩地能打五百斤。”总理接着又问：“麦熟季节，你们村的劳力够用不够用？梁喜禄报告总理够用，总理马上说：“那别的地方劳力不够用时，我可找市长向你们借人哟！”一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这时总理在地边俯身拾起几颗丢在地上的麦穗对村干部说：麦子丢了太可惜；你们要想法做到颗粒归仓。”

这时，我发现总理非常谦虚，当看到有记者将照相机要对准他时，总理就故意扭过头去。因而使随从来的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的记者，感到拍摄总理的镜头是很困难的。

从麦地出来，我们陪同总理又朝南边棉花丰产方的地里走去。大约走了十几米远，总理突然问到：“哟，这里的棉花怎么都茶头了？”王满红马上解释：“这是因为天旱，是蚜虫咬的。”

“那有了蚜虫棉花还能长吗？”“我们已经组织劳力除治了几遍，基本上都消灭了。”听了王满红的话，总理又向前走了一段路拐到棉花地里，总理蹲在一个棉花棵下，很仔细地把卷起的棉花叶子轻轻展开。这时，总理发现叶子上有一只虫子便问：“这是什么虫子呀？”王满红回答说：“我们这里叫这种虫子为花大姐。”“噢，花大姐，这名字有意思，那它是好虫还是坏虫呢？”是好虫，是吃蚜虫的。”梁喜禄回答，总理一听，就捉住这只花大姐放到几个蚜虫边，刚一放，花大姐飞了，总理又捉回原处，结果蚜虫也跑了，总理抬起头来问：“那它现在为什么不吃蚜虫

呢？”“现在真让它吃，它不一定吃。”总理听梁喜禄这么一说乐开了，风趣地说：“大概是看我们现在人多，它害臊了吧！”一句话又把大家说笑了。从棉花地里出来，总理和大家一起向马路走去。这时总理问起村干部棉花亩产皮棉多少斤？生产上还有什么困难？”当来到马路上，总理看到有几位村干部站在那里，就上前和他们握手，边握手边问他们的名字？干什么工作？当他看见边走过来一个解放军，马上伸过手并说：“噢，军人。”这位解放军还没来得及向总理敬礼，已被总理的手紧紧握住了。在此同时，村妇联主任袁凤鸣、团支部书记杨凤英她们都是妇女由于心情不平静而怕见总理，却悄悄地走开，她俩的表现被细心地总理一眼发现，并立即问道：“她们是谁？怎么走了？”村干部喊叫她们：“总理叫你们呢！”这时两位女同志才红着脸走回来，总理笑着和她俩握了手，然后才向小轿车走去，车虽然走远了，总理仍在车里向大家挥手告别。

总理乘坐的车尽管已经无影无踪，可我和村干部还站在原地不肯离去，不知为什么那颗兴奋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总理视察留营村已经时隔三十个年头，可总理那亲切慈祥的面容，和蔼可敬的话语，平易近人的作风却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受到鼓舞，激励和鞭策。

周总理走后，还惦记着留营村的生产，不久由总理签署的，以国务院的名义，奖给了留营村“农业先进单位”的奖状。在接受奖状的第二天，全体村干部和农民，怀着兴奋和自豪的心情，召开了全村欢庆大会，感激总理的无比关怀和厚爱。

（崔旋之回忆）

瓜 园 客 人

——陈老总下乡体察民情

王国乔记录整理

1970年7月上旬，有一天，晌午的太阳象一个火球，烤得大地滚烫滚烫的。我们几个人摘了一上午西瓜，又累又热，刚想躲到地头的瓜棚里休息休息。只见从南边道上徐徐开来一辆黑色小轿车，车到瓜地边，稳稳地停下了。从小车里走出了两个人，前边是一位身材魁梧，眼戴墨镜，穿一身灰色便服的人，后边跟着俺村在市里工作的王冬臣。前边的老人笑嘻嘻地跟俺们打招呼说：“大伯，今年的瓜长得不错吧。”说着，小心翼翼地蹑起脚尖朝瓜棚走来，生怕踩坏了瓜秧。

客人来到瓜棚下，与众人就地坐下。我挑了两个瓜举刀切开，送给客人品尝。那位穿便服的人接过瓜笑呵呵地咬了一口，操着南方口音说：“老大伯，这西瓜好甜呀！是什么品种，来来，一块吃嘛。”说着递给了我们每人一块，他倒象成了主人。随后又问：“现在农村分红多少？生活怎样？”他那平易近人的语气和随随便便的举止，使我们一下子觉得象一家人，谁从心里都不拿他当外人。大约半小时光景，客人要走，示意让跟随他的老王算账。乡下瓜园多年传下来的习惯：大热天，过路人吃瓜不收钱。我们执意不收，客人认真地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都白吃白拿不就坑害了社员们啦？”这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没办法，俺们第一次破了规矩。收下了过路客人的瓜钱，目

送客人进了轿车……

时隔月余，老王回家探亲，我向他问起吃瓜的老人。他爽朗地笑着说：“谁？打江山的开国元帅陈老总！”啊，是他老人家！怪不得那么亲近哩！陈老总当年领兵百万，名震中外，如今下乡体察民情，一不用护兵，二不兴师动众，吃瓜还按价付钱……早知是他老人家我们决不收他的钱哪！我们今天的甜日子，还不是多亏了他们这些老革命家吗？。

陈老总去世十几年了，但每当谈及陈老总来瓜棚这件事来，他那音容笑貌都久久在我们心中回荡，激励着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

附：文中涉及的老王同志，系在市公安局工作的王冬臣同志（原籍、大马村），当时市委派王冬臣同志负责陈毅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口述人：王臣，大马村农民、现年58岁。

记录整理人：王国乔，大马村农民，现在48岁。

地下前哨——于底感化院

杜勤来记录整理

(一)

抗战胜利前夕(1944.7—1945.6)，威震一时的于底感化院，名誉上是日本鬼子的特务机关，实际却是我地下党潜伏在敌占区一个坚强的堡垒。关于这个感化院，追本溯源，须从日军南兵营说起。

当时，设在石门市西郊的日军南兵营，也是战俘集中营。里边关押“犯人”绝大多数是抗日战场上落入日寇手中的八路军战士和我党地下工作者，以及少数国民党士兵。整个南兵营由为数不多的鬼子兵控制着，运用战俘管理战俘的手段进行“东亚共荣”的奴化教育。因集中营里八路军占绝对优势，其“教育”结果自然事与愿违，真正的革命战士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千方百计与鬼子进行斗争和周旋。正如曾在南兵营被困过的我地下工作者张荫桐同志回忆说，当时有几个八路军战士骗取了鬼子的信任，成了“皇军”眼中的“战俘楷模”，以致从战场上被押下来的中国士兵还要经过他们的审讯。若是不幸被俘强行押来的，总会受到“楷模”们的关照保护，若是投敌变节者，在“楷模”们手下则严惩不贷。曾有个叫殷老白的战俘，刚被押来就向“楷模”谄媚，说自己要诚心投靠皇军，还带来一支步枪。“楷模”当即雷霆大发，责问他为什么不偷一挺机关枪来，鸡毛算皮点东西还想骗功？将他打得半死。为此，“楷模”受到了鬼子的夸奖。

后来，南兵营的“皇军”仿佛从“楷模”们身上悟出点什么，便另生“妙计”，于1945年3月，抽调了十几个“战俘楷模”到获鹿城组建了“皇军感化院”，妄图利用这一特殊的机关，破坏我党地下组织，镇压抗日力量，达到“感化”我敌工人员的目的。当时，从南兵营被抽调的“战俘楷模”有王振东（原名孙义，冀中七分区作战参谋）、马志强（原名马景，冀西36团）、张庆昌（原名张江，我党灵寿县政府工作人员）、李庆华（原名蒋庆昌，八路军某部连长）、李升阳、刘君、陶三喜、白福山等十几位同志。

1944年7月，为保护座落在大郭村村东的日寇飞机场，日军华北1117部队大尉泽井委派驻石门市日军上士井上久男，翻译李四（日本人）直接负责，将获鹿感化院的王振东等全部调到大郭村西二里的于底镇，地址设在财主谢洛黑后大院，定名为“挺进队”，后又更名为“兴亚工作队”。但因为这帮人全是由获鹿城原感化院迁来，所以，当地人一直沿袭称之为“于底感化院”。是时，鬼子又从南兵营调来“战俘楷模”张荫桐（冀西四分区战士）、庞绍斌（沈阳军区参谋长）、杨玉生（太行一分区班长）、王会民、谢中和、张庆祥等十多位同志。1945年3月，又从南兵营调来洛阳战场被俘的八路军战士及少数国民党士兵，此时的感化院已具有七八十人的规模。

于底感化院一切衣食费用由当地各大乡供给，着装便衣，胸前佩戴一“△”铜制牌徽，牌徽白底，中间为红色“王”字。

在组织机构上，日军1117部队上士井上久男派伍长川户，翻译李四常驻于底感化院。委任王振东为“兴亚工作队”队长。下设三个小分队，小队长分别由庞绍斌、杨玉生、王会民担任。一、二小分队又各自分设步枪、手枪、情报三个班，第三小分队则只设有两个情报班。这就决定了感化院是以搜集情报为主旨的武装特务机关。

于底感化院内80%是我党地下工作队，敌工队受我太行一分区，冀西四分区双线领导。当时，庞绍斌、杨玉生等通过康庄村程德山在于底大街开的自行车铺建立了联络点，有时利用杨玉生妻子来感化院探亲之机与我太行一分区传递密件进行联系。而张荫桐、马景、王振东等人则通过岳村财主敦洛明做为接头人与我冀西四分区联络员孙树元同志（平山人）直接联系。感化院里我地下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敌人情报，镇压汉奸恶霸，发展革命力量，并为我军输送枪枝弹药及医药用品。这样，感化院表面上是日军的特务机关，实质是由我党领导、指挥潜伏在鬼子眼皮底下的一支别动队。

（二）

感化院一特别是情报人员一都是单独行动的。我敌工队在组织上是绝对保密的，因此，在行动上不得有半点疏漏。他们利用种种假情报，造成假象，千方百计“顺从”鬼子的旨意，骗取信任。一次，感化院向鬼子报“密”：距于底北十里的大河村发现几处地道，并驻有八路军区机关。第二天，鬼子便纠集三个特工队前去搜捕。情况果然属实，只不过八路军的区机关人员早已闻风转移。其实，鬼子得到的这个“重要密报”，是我党区机关撤离前事先通知感化院张庆昌同志的。1944年春节前夕，感化院五、六位同志夜间在徐家庄村南，一阵枪声后，“缴获”了八路军两支步枪，枪柄上还带有不少血迹。为此，大大受到鬼子的嘉奖。其实，那是八路军事先放在树下的两支破枪、枪柄上的血迹是事先涂在上面的鸡血。总之，感化院敌工队的每次行动都是事先与领导联系好的，即是发生短暂的枪声“遭遇战”，有意安排，甚至带同一点破旧的“战利品”，向鬼子缴功请赏，迷惑“皇军”。

原太行一分区八路军战士赵树森（郊区北杜村人），因为在残

酷的战斗中与部队失去联系而暂时躲避在家里。后来，经我地下党指示，感化院便把赵树森同志“抓”进来“审讯”、“感化”。南高基伪保安队的周春山，因对日伪不满，经我地下党石门情报站站长赵完璧介绍，感化院也立即将他“抓”进来，经对他进行革命教育，使周春山成为感化院中我敌工队一名成员。类似的行动，感化院名誉上为鬼子铲除了赤色嫌疑，实际上充实了我地下工作队的力量。

感化院在方圆几十里名声十分厉害，为反奸除霸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原八路军连级指导员张文卿被俘后投敌变节，充任日军驻石门特务科主任，敲诈奸淫无恶不作，感化院几次组织行动抓捕他，吓得他四处龟缩，惶惶不可终日；经侦察，石门大桥街聚源旅馆驻有秘密剿共组织，感化院敌工队张荫桐、王振东等奉命将佐二丑等两名反共首恶分子给予处决；石门西花园伪派出所，横行街巷，为虎作伥。人们称之为“虎狼窝”。感化院化装出动，一夜间把它搞了个人仰马翻，并给伪所长定下了约法三章：国民党获鹿县地方参议员李××（孟章村人）认贼做父，被我感化院敌工队以“通共”罪名，趁其回老家之机，将他绑缚严惩；就连日军西兵营的翻译官董信也波感化院找借口抓起来惩治使之叫苦不迭，直至日军少府亲自前来说情才放其回去。至于对当地一些地痞、狗腿子等与民为害的恶棍，更是手到擒拿，随时惩罚。

对于那些横行乡里、坑害百姓的坏人，感化院从不放过。敌工队张荫桐同志曾两次在千底大集上当众把强勒民财的日伪收税人员打得鼻青脸肿；一天黑夜，一个黑大汉在上京村南冒充感化院的人，路劫一走集上店的土布商贩，正好遇我敌工队，便立即将黑大汉扭押感化院，直至他立保划押，发誓不再作恶害人才放他回家；1945年初，三个束鹿县土匪，假冒感化院，向小毕村百姓索要两挂双套大马车。这种强行敲诈很快被感化院发

觉，立即前往抓捕。其中一个逃脱，被抓住的两个交获鹿保安队，适逢于底大集日当众枪决。

感化院的频繁出动，行动之神速，打击之严厉，使之威声大震。利用以奸反奸的策略，瓦解和捣毁了一个又一个日伪组织。感化院敌工队可以随意出入任何关卡，就连日寇设在柳辛庄的正牌特务机关一赖固队，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对于底感化院不敢轻易过问。

感化院的生活是艰苦的，穿粗布衣，吃的是粗粮，发的饷也不多，尽管这样，按规定不许用任何手段敲诈百姓。敌工队王振东因工作之便在大乡里收取贿赂（半匹白洋布，一袋面粉），受到地下党组织的严肃处分。梁国华则因讹诈乡民，多次教育仍执迷不悟，后又发现他有变节之心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在鬼子面前告他“抓匪不利”，将其谴返南兵营。在押送途中，由一鬼子兵监押，我地下工作队设法扎坏鬼子兵的自行车轮胎，造成梁国华逃跑的机会。梁国华果然惶惶逃跑，敌工队将其趁势枪决。

（三）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6月20日，日军1417部队下令：于底感化院于6月24日全部调往唐山。敌工队当即将这一情报汇报了太行一分区和冀西四分区。上级立刻发来联合通知：一个不走。

经严密布置，6月23日晚上，太行独立营参谋王志忠带领一行人前来接应。感化院内由庞绍斌，杨生玉指挥；赵树森安排岗哨及接头暗号；张荫桐负责控制两个日本兵。晚上十二点整、接应小分队和敌工队的接头暗号——房上的手电和地下的手电同时亮了三下。随即，日本兵伍长川户与翻译李四的屋里一声手榴弹巨响，张荫桐同志击毙了这两个鬼子兵。敌工队挟迫着感化院几个国民党士兵随着太行一分区的接应队伍，天亮前奔进了太行山解放

区。对于这次成功的行动，感化院敌工队的同志们后来编了顺口溜：

四五年的“六·三三”。

“不平常的一夜间。”

里应外合拉出去。

一直奔向太行山。

口述人：张荫桐 赵树森

《于底感化院》附记

张荫桐：

原籍深县，现年65岁，1939年参加深县人民自卫军（八路军）。1944年潜入于底感化院做我党地下工作。1945年10月入党。感化院被我党捣毁后，返回深县任深县委文书，解放后历任深县武装部参谋，县公安局文化教员，衡水地区武装部科长，沧州公安大队付队长等职，1956年任石家庄市体委办公室主任。现已离休。

赵树森

郊区北杜村人，现年66岁。1939年在平山加入八路军，1943年，潜入于底感化院进行我党地下工作。1944年6月，感化院被我地下党摧毁后，回村与其父赵赶年一起做党的地下工作，被称为“红色堡垒户”。解放后，在本村曾任民兵队长，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长等职、现在家务农。

石桥地下印刷厂

敦春玉记录整理

一九四二年春天，经人介绍，我到石门市（现石家庄）新市区一家印刷厂工作。当时我的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学的是制版。因为我喜爱书法，所以这工作很对我的口味，时间不长我就掌握了楷、隶、仿宋等几种字体。那时我们是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谋生，厂里印的主要是亲日的宣传品和广告等。四三年，听师傅说，厂里有了共产党组织，有时秘密印些抗日传单，领导人是乔石。

在四三年夏天，一个傍晚，师傅把我叫到一间仓库里，一进门里边坐着三个人。师傅指着中间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学生模样的人说：“这就是乔石同志。”乔石马上站起来同我握了握手，微笑着问：“你就是老敦吧？咱们可要在一块打仗计了。”“可我还小，没出徒哩。”我认真解释着。“你在师傅面前小，在我面前可是老敦哟。”说完逗得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接着师傅把我的情况向乔石做了介绍：“他叫敦玉雷，农村来的，家里很穷，胆大心细，靠得住。”师傅还介绍了另外两个人的情况。一个是东北人，姓王；另一个是我的老乡，获鹿县落陵村人，姓陈。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点，一个是印刷工，一个是机修工。

乔石给我们谈了一下工作。说是要我们三人跟他去干几天

活，秘密干。

那天晚上，一辆汽车开到厂里，把我们三人接出去，送到石桥村，汽车在一家大门前停下。乔石早已到了，他和房东把我们领进院内。这是个三合院，房子盖得满不错，看样子不象一个穷苦人家。房东姓马，把我们领到他家后院一个地窑里。房东冲乔石说：“就在这。你看准备得行吗？”乔石点了点头。

借着煤油灯的光亮我看到在这个地窑里安放着一台印刷机。乔石对我们说：“从今天起，咱们就在这里干一批活，干完后，我再设法送你们回厂。”当时就给我们分了工：老王和陈管维修、印刷，我负责制版校对，房东管生活和联络。

工作开始了，都是在晚上干，白天除吃饭上来放放风，以外时间不许出地窑。乔石看我们干得挺顺利就走了。每过三五天来看一次，并亲自把印好的纸票过数、包装、封存好。我们印得是晋察冀边区币。面额为一仟圆、两仟圆、一万圆、两万圆。乔石对我们的活要求很细，他自己干起来也很认真。

有一天，乔石来到地窑，把我们叫到一起，他问我们：“日寇不仅向山里打得很疯狂，在平原闹得也挺凶，这批活干完后你们不能再回工厂了，下一步打算去哪？”我说：“离家不远，回家种地去，老不回家，家里人还不知我出了什么事哩。”老陈也说先回老家。乔石点了点头，看了看老王：“你是东北人，回不了家先跟他俩去躲一段时间行吗？”老陈说：“行。”

又过了几天，乔石来到地窑，和往常一样把印好的票子装好，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这儿的事完了，今夜你们就离开这里马上回家，一个月来你们为抗日做了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为你们准备了介绍信，回去找当地党组织接头，关于回厂的事，等胜利了再说。”乔石说得很严肃也很诚恳。我们换好衣服连夜离开了石桥村。记得，当时我们三人先在我家住了一天，老陈带着老王回落陵去了。第三天听人说，石桥村出事了。

说是我们离开的第二天凌晨，特务领着一队日本兵包围了我们印刷大院，把全部边区票没收，连房东老马也一起带走了。

回村不久，我根据乔石的指示找到大河村与地下党接上头（大河村原是获鹿五区区政府所在地），区委派我担任区南片联络员，第二年我入了党。

日本投降后我曾多次打听乔石的下落，但始终没找到。解放后，四七年冬我在村政府任文书，曾收到过一封信，内容是通知我到石家庄新华印刷厂商量恢复生产并让我担任制版车间的领导工作。由于村里工作离不开，家里地多劳力少我没有去，直至六四年始终在村委会当干部。

口 述：敦玉雷，现年74岁，党员，郊区岳村，
农民。

记录整理：敦春玉，于底学校校长。